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系史*

第一部份 台北帝國大學經濟學講座之誕生與發展

1928年，創立台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台北帝大）時，設置文政學部及理農學部，依據1918年12月，日本政府公佈「大學令」第2條的規定：「大學以設置數個學部為常例…學部設為法學、醫學、工學、文學、理學、農學、經濟學及商學各部。於特別需求之場合…得分合前項學部設置新學部」，台北帝大創設時的兩學部，顯然依此規定而來。其中，文政學部再設置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經濟學在創校階段便為文政學部12個講座中的一個講座¹。爾後，翌年4月，於台灣總督府敕令第60號所修改的「台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經濟學再增設1個講座，成為2個講座。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文政學部雖曾申請增設經濟學講座，然而皆未能獲得台灣總督府的認可²，始終維持在2個講座的規模。

另外，在修課的科目方面，1928年3月，台灣總督府公佈「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其第4條規定政學科必修科目中的經濟學科目，計有必修「經濟學（原論）」1學分、選修「經濟學（財政學、經濟政策）」4學分³。

1 文政學部政學科的設置

依據井出季和太所著《台灣治績志》記載可知，在殖民地台灣設置大學的建議，乃於1899年的日本政府內部即已出現，然「於草創之際，在台灣設置教育機關，在統治上並非可輕易解決之事」⁴，故未能付諸實現。1919年，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曾

* 本系史初稿為系方邀請本系系友東京大學經濟博士專攻經濟史，現任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的黃紹恆先生所作。之後經全系同仁集思廣益校稿。並特別感謝陳正澄教授、張素梅教授、張清溪教授、葉淑貞教授與林建甫教授所給予的寶貴意見及周尙民助教、李順發助教與陳映暉助教對於本文與表格資料的修改與整理。

¹ 根據1928年3月敕令第33號「台北帝國大學講座令」規定，文政學部設置12個講座，分別為國語學、國文學、西洋文學、東洋史學、哲學、哲學史、東洋倫理學、西洋倫理學、土俗學、人種學、憲法、行政法、經濟學、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

² 〈文政、理農兩學部新規要求全減か〉（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7年11月22日）。

³ 除經濟學相關科目外，尚有必修科目：憲法（1學分）、行政法（2學分）、民法（4學分）、刑法（1學分）、東洋倫理學概論（1學分）、法律哲學。選修科目則有政治學、政治史（2學分）、民事訴訟法（1學分）、刑事訴訟法（1學分）及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臨時開設之科目。

⁴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灣日日新報，1937年2月）751—752頁。

表示應在台灣設置醫、農及文科大學⁵。受此發言的鼓舞，台灣的輿論亦表示對設立大學的支持，甚至有「台灣大學期成同盟會」之類組織的出現，積極宣導在台設置大學的必要。

就法制而論，台灣得以設置大學的法源，首先有 1918 年 12 月日本政府公佈的「大學令」，然後再是以此為基礎的「台灣教育令」〔1922 年 2 月由台灣總督府公佈〕，其中第 10 條規定台灣的大學教育及其預備教育以「大學令」為依據。不過，如第 11 條規定，文部大臣在台灣的職權由台灣總督代為行使，台灣的大學因而在台灣總督府直接的主導及監督下創設、運作。如果「台灣教育令」未列在台灣設置大學的條項，則無日後的台北帝大。只是前引田健治郎既已表示欲於台灣設立大學，在其任內公佈實施的「台灣教育令」列入設置大學一項，至為理所當然。

「台灣教育令」的公佈與實施給予創設台北帝大法源，接著才有在 1925 年度台灣總督府預算中的「大學創設準備費」、1926 年度的「大學經營費」等項目之出現。

不過，台北帝大的設置與台北高等學校（以下簡稱台北高校）的設置有密切關係。

根據松本巍所撰《台北帝大沿革史》之說明，台灣總督府提請設立台北高校時，文部省最初並不贊成，理由為「文部省的高等教育機關擴張計劃中未考慮到與台灣、朝鮮的關係，如台灣的高等學校其畢業生進入內地的大學，其擴張計畫有破壞之虞」。

松本這番指陳應可作如下的理解：於甲午戰爭後，帝國大學的畢業生逐漸成為日本政府高級官員的核心，於是帝國大學自然被日本社會視為登龍之門。而依據法令，高等學校畢業生可免試申請進入帝國大學就讀，故進入高等學校可說已一腳踏入帝國大學。至於由專門學校等非高等學校考進帝國大學者，則被稱為「旁系出身」。此外，台北高校的設立與紓解日本國內高等學校的升學壓力有直接關係。為解決日漸激烈的升學競爭問題，日本政府於 1917 年召開臨時教育會議檢討日本的高等教育政策，並於 1919 年完成高等教育擴充計畫書，估算 1925 年將有 3 萬名學生自中學畢業，假使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畢業生繼續升學，即有 2 萬人湧向高等學校。然而現有公私立高等學校只能招收 1 萬 4000 名學生，加上正籌建學校預定的招生數 2200 名，總共也只有 1 萬 6200 名。亦即為能讓所剩的 3800 名中學畢業生有學校可讀，勢必要增設高等學校。再加上稍早 1919 年公佈的大學令放寬大學的設立，亦為高等學校的增設提供條件⁶。松本所云文部省對台北高校

⁵ 吳文星、廣賴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96 頁。

⁶ 竹內洋《學歷貴族の榮光と挫折》（中央公論新社，1999 年）。

設置持保留態度，其原因就在於上述的計算並未把殖民地盤算在內，台北高校畢業生的出現，勢必攪亂文部省整個規劃。因此，台北高校一旦設立，帝國大學在台灣設置也就有其必要。

在台北帝大的科系設計方面，則與第 1 任校長幣原坦的殖民地教育觀點有關。

幣原日後回憶當時台北帝大的設立，言其於 1924 年以文部省命令考察歐美各國的文化史研究，當時行程由希臘、義大利、法國，再依預定前往英國時，外務省傳來電報希望他能立即回國，主持台灣的大學籌設事宜。不過，幣原並未立即回國，一直要到 1925 年 7 月 23 日之後才來台。

「在台灣，以大學創設為前提的高等學校已於幾年前設立。如果要在台灣設立大學的話，必須要收容這些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因而應該是一所綜合大學。然而限於經費，無法自始就將所有的學部設置齊全…台北現有高等農林學校及醫學專門學校，是要將之納入大學併設為農學部及醫學部？台灣原來只有漢學一門學問，領有台灣之後，又見到國語（按：日語）的傳來使得新教育日漸發達，因此也不能將文學置之度外」，經過審慎的考量，幣原向台灣總督提出內含農、醫、文科的大學設立案。

同年 10 月 9 日，於第 1 次大學創立會議中，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提出何不從「學問的基本」，即理學部與文學部開始的意見。兼任創立委員會委員長的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則表示以台灣的現狀而論，只有理、文兩學部，將使畢業生的就業發生困難，結果會削弱大學設立的效果。由於此次會議的與會者並未達成一致的看法，於是幣原重新擬定折衷案。

新的幣原案是理科加上農科、文科加上法科，特別是法科的加入與幣原個人在爪哇（當時仍為荷蘭殖民地）的見聞有關：「在爪哇，雖然教授這類學問的歷史並不長，但是到了逐漸需要啓用土著為官吏時，乃開始設立土人官吏養成學校，教授法律及經濟的學問，然後再予以晉用。爾後，菲律賓的學務局長巴洛斯博士考察爪哇時，對此大為感動，覺悟到美國經營菲律賓正欠缺此措施，以及無方針地採用土著的錯誤」。

另外，幣原亦觀察到當時台灣人青年甚多希望就讀法科的情形，如果不在台灣設置法科而任由這些學生離開台灣求學的話，他認為「是等學生或見到內地的黑暗面或被不良思想所惡化，生出統治上的障礙，此憂慮與年俱增。至於赴中國者，感染近年排日及赤化的惡風，更需要考慮」⁷，因而與其在問題發生之後再設法科，還不如現在就事先準備。

⁷ 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

對於幣原新案，伊澤再度指示雖說設置法科，也不是要製造依賴法律維生的「法律屋」，既然設為法文學科，總要使得所有學生學習東洋的道德哲學，於是「文政學部」拍板定案⁸。

由上述文政學部設立的經緯可知，在初步的「法文學科」階段，主要是因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對策與青年思想問題的防患等的考量，才有法科的增設。不過，在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對東洋道德哲學的重視，使得文科的地位高於法科。曾經於文政學部客座的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也認為台北帝大不像日本國內各地帝國大學設置「法文學部」而是顛倒文法兩科，顯然是台灣總督府並未對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學科給予應有的重視⁹。或許也就是如此的原因，相對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經濟學不僅內容豐富、自成體系，而且已成為獨立的學部，台北帝大的經濟學明顯不足而且未受應有的重視。

然而，台北帝大是否如若干先行研究所指，其創校理念為「國家主義」，在性格上為「國策大學」¹⁰，若由上述成立的經緯而論，恐怕仍有相當程度的商榷餘地。此外，如文政學部的設置，也未必是為了有利於學科之間的交流及綜合¹¹。反而可說直接受限於台灣總督府的預算額度，因為很顯然，學科之間的交流及綜合未必只有將文、法科合併成一門學部的做法。

法科，也即是政學科在文政學部內處於一個較獨特的位置，不僅必修科目與其他哲、史、文學科不同，對畢業學生所授與的學位為法學士，不同於其他三科的文學士。然而，政學科的課程設計由於欠缺當時高等文官考試所必須的課程，使得台北帝大的文政學部不足以吸引包括台北高校在內的高校畢業生¹²。如果台北帝大真是基於國家主義的國策大學，恐怕在課程的安排上當不致呈現如此狀況。

2 經濟學講座教師的研究教學概況

台北帝大係由相對獨立的若干講座所共同組織成的大學，在此講座制下，由教授、助教授、數名助手及外聘的「講師」¹³構成各個科目的研究及教學。而台北帝大的經濟學發展及授課內容，以及實際擔任教學的人員，則如表 1 所列經濟學講座的小山

⁸ 幣原坦《文化建設—幣原坦の六十年回想記—》（吉川弘文館，1953年）108—109頁。

⁹ 河合榮治郎〈内地への憧れ 潑刺たる本島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6年2月17日）。

¹⁰ 例如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¹¹ 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¹² 中村孝志著、陳俐甫譯〈台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¹³ 此處的講師並非戰後台灣的大學學制中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的教職等級，純為外聘的教師，這些受聘的講師大都在原校已有相當程度的學術成果及地位。

田小七、楠井隆三、今西庄次郎、北山富久二郎、東嘉生及吉武昌男等人的研究業績及教學成果直接構成經濟學講座的内容。以下就目前筆者所能掌握的資料，對其中幾位做個別的說明：

楠井隆三 號龍象，1899年，出生於和歌山縣，第一高等學校出身，1924年4月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同年12月任第二高等學校講師，1925年升任教授，1927年轉任台北高校教授，並成為台灣總督府海外研究員，留學英美德奧法等國，1929年10月來台並轉任台北帝大助教授，1930年4月再升任教授職並擔任文政學部經濟講座¹⁴。

楠井幾乎擔任整個台北帝大時期基礎經濟學（「經濟原論」）的教學工作，因此不論其所使用的經濟學教科書或是個人的研究，顯然都對文政學部的學生及台北帝大的經濟學研究，帶來極重要的影響並構成主要的內容。

楠井的經濟學研究取向，首先可由表2所列其長期使用的教科書——高田保馬所著的《經濟原論》窺知一二。簡言之，高田的經濟學可說奠基於從瓦拉斯（M.E.L. Warlas）以降的一般均衡理論及熊彼得的經濟理論，為日本經濟學界一般均衡理論及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先驅¹⁵。

楠井就經濟學的方法曾於台北帝大《政學科研究年報》第1輯（1934年5月）發表名為〈理論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認識論的一齣——〉，並於1937年6月16日的台北帝大「金曜會」集會中提綱挈領地發表己見。

要言之，楠井曾經指出，在理論經濟學所遇到許多的「經濟法則」，有些諸如心理學、技術學性質的要素，在理論上不屬於經濟學，有些則理所當然屬於經濟學。為了維持理論經濟學的純粹性與獨立性，這些「非經濟學」的要素必須予以排除。所剩下「純粹經濟」的部份，則根據內容分門別類給予適當配列，以獲得完整、全面性的經濟學體系。楠井認為最足以代表這種體系的經濟法則為「競爭價格的法則」，這是因為構成此法則係使用最為「純正」而且「精密」的演繹性方法。楠井表示「追求經濟法則在理論上的性質，最後將到達經濟現象的函數法則。而此見解不僅在近年有逐漸變得有力之情形外，亦屬於均衡理論的理論」¹⁶。

楠井雖畢業於1920年代中期的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卻選擇高田的著作當作教科書，同時由其所主張「純粹」經濟法則、函

¹⁴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1943年3月15日）122頁、新高新報社編《台灣紳士名鑑》（1937年6月23日）180—181頁。

¹⁵ 向井利昌〈高田保馬〉（大阪市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經濟學辭典》第2版，岩波書店，1988年1月，842頁）。

¹⁶ 楠井隆三〈經濟法則の論理的性質について〉（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176號，1937年6月30日）。

數法則等各項可知，不僅未感染到同時期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傾向馬克思主義的風氣¹⁷，更可說相當早期地留意到在日本剛起步不久的一般均衡理論，而且楠井或許可說是台灣近百年來引進1870年代「邊際革命」以降西方經濟理論之先驅。

楠井也擔任了幾年「經濟學史」的教學，其於1934學年度的課程說明中，標明主要內容為「自亞當斯密以降古典著作的系統性研究」。與此相關，楠井隆三與後述的東嘉生曾經合譯過馬爾薩斯於1814到1815年所寫有關「穀物條例」(Corn Laws)的3篇文章，並於1940年10月由岩波書店匯集成《馬爾薩斯的穀物條例論—地租論—》出版面世。所使用的版本為台北帝大及東京帝大所藏的德語譯本，先由東嘉生翻譯，再由楠井綿密地校對更正¹⁸。不過，由前述楠井的方法論及後述東嘉生的研究業績，加上該書的解題係由東嘉生負責執筆，或可言該書對東的重要性及意義，恐怕更值得注目。

另外，楠井自1930年代末以降，也開了幾年「社會政策」的課程。由楠井在1941學年度所使用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河津暹所著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可推知¹⁹，台北帝大的這門課未必等同今日見諸社會學系的相關課程。

就東京帝大經濟學的內容而言，在明治20(1887)年代英國古典學派的學說式微之後，直到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滲透為止的此段期間，透過同學部教授和田垣謙三、金井延等人的引介，G. Schmoller等人的德國歷史學派理論為其主要的內容。與F. List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G. Schmoller等的德國歷史學派學者所面對的德國已是工業革命完成，勞資對立問題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狀況。G. Schmoller等人的經濟理論又稱為「講壇社會主義」，所關注的問題在於如何緩和上述的階級對立，他們不主張採取英國古典學派自由放任的思想，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激進作法，而主張以國家的積極施行解決勞動者窮困問題的社會改良政策²⁰。這派理論進入東京帝大之後，便以勞動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政策」再現²¹。相對馬克思主義將勞動問題與政治勾聯一起，G. Schmoller等人則將之與社會問題結合，兩者在當時皆屬於經濟學的範疇。

基於上述之緣由，河津的著作縱使非完全向重視國家角色的

¹⁷ 有關同時期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的情形，可參照黃紹恆〈張漢裕教授學術源流考〉(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

¹⁸ 楠井隆三、東嘉生譯《マルサス穀物條例論—地代論—》(岩波書店，1940年10月)。

¹⁹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264號，1941年4月30日。

²⁰ 橋本昭一〈講壇社會主義〉(大阪市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經濟學辭典》第2版，378—379頁，岩波書店，1988年1月)。

²¹ 有關此點可參考大河內一男《社會政策四十年 追憶と意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5月)。

新歷史學派理論靠攏，但是就絕非出自馬克思主義一點，就能通過當時日本法西斯勢力箝制思想的網目，而得以採用為教科書，同時楠井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亦可由此理解。

由於台北帝大採行講座制，講座教授對所屬的助教授、助手、副手，無論在人事或研究上皆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不過囿於資料的限制，其實際情形無法確知，從片段的資料得知楠井曾協同當時已升任講師的東嘉生、吉武昌男，以「台灣移民村的研究」為題，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研究補助²²。

今西庄次郎 1901年5月出生於大阪府，1924年大阪高等工業學校畢業，1927年高等文官考試及格，1928年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0年6月台北帝大任助教授²³，1943年升任教授²⁴。由授課內容及其論文的發表情形，可知今西的學術研究以經濟政策（尤其是工業政策）及商業為大致方向，而且講課的內容似乎與時事有一定程度的貼近。例如1933年度所開的「經濟政策」，其商業政策的部份，所主講的題目為股票交易所的理論，工業政策的部份則為歐戰後德國的賠償問題²⁵。

北山富久二郎 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1925年）。根據台北帝大的《學內通報》記載，其在台北帝大奉職達11年餘，於1942年3月23日轉任東京帝大經濟學部²⁶。由此推算北山來校服務當在1931年左右，即台北帝大創校後3年。邱永漢在其自傳性的著作中提到北山為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山崎覺次郎教授的弟子，其轉任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職，當有其人脈上的理由²⁷。

詳言之，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勢力的抬頭及對校園的滲透，該學部遂出現以土方成美（1933年曾任台北帝大政學科「財政學」講師）等號稱「革新派」的教授群，再加上主張自由主義的河合榮治郎教授（1936年曾任台北帝大政學科「社會政策」講師）等人的力量，與矢內原忠雄、大內兵衛等傾向馬克思主義的部份教授，在教授會中形成左右對立傾軋的關係，此不和的情形，直到1939年由當時校長平賀讓強行介入經濟學部的人事改造，進行所謂「平賀肅學」才「告一段落」。北山的業師山崎覺次郎在經濟學部算是第一代教師，學問的系統屬於奧國學派，不僅在學術的立場上較為超然，同時也因世代的關係亦未捲入上述教師間的紛

²²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278號（1941年11月30日）。

²³ 新高新報社編《台灣紳士名鑑》（1937年6月23日）11-12頁。

²⁴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306號（1943年2月28日）。

²⁵ 國立台灣大學藏《卒業豫定學生名簿並就職希望之調》。

²⁶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285號（1942年4月15日）。

²⁷ 邱永漢《わが青春の台灣 わが青春の香港》（中央公論社，1994年8月）35頁。

擾中²⁸。「平賀肅學」之初，包括山崎覺次郎在內的長老級教授被動員出來收拾殘局，前述北山的人脈上理由，當表現在與山崎的師承關係及山崎的較不具爭議性²⁹。

不過，北山在轉任之前，對「平賀肅學」後亦佔優勢的「革新派」教授之論調，曾經於 1938 年 5 月 24 日的台北帝大「政學科研究會」集會上，以「革新學派的理論」為題，舉出「大學特別是經濟學部能否或是應否成為政府的智囊乃至經濟參謀本部的重要一環？」的問題，評介土方成美、本位田祥男所主張的大學革新論。並附帶列舉「大學教授的國家思想」、「科學與國民理念的乖離」等問題、「為國效勞」與「迎合政府政策」的區別、學者應擔負「社會的理性」之批判使命，鋪陳己見，表明自己的看法³⁰。雖然目前無法得知其講演的全部內容，由其日後轉任東京帝大，或可說北山對「革新派」並未有明顯的批判色彩或是敵意。

北山在台北帝大的研究與教學，由表 2 及表 3 可知以財政、金融為主，尤其是刊載於《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豐裕」的台灣財政〉及第 2 輯〈台灣秤量貨幣與我國幣制政策——「銀塊流通的金本位制」——〉，可說是今日研究台灣經濟史必讀之文獻。另外，北山自 1935 年起，就台灣向華南及南洋進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調查，分別就市場、資源的調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商品運銷機關、海運航空、出口工業的獎勵、國內外錯綜渾沌的經濟情勢等各項，進行調查研究。1936 年以「以台灣為中心的產業政策研究」為題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研究補助，同年 7 月 6 日從台北出發，依序歷訪東京、神戶、蘇拉威西、爪哇、蘇門達臘、馬來半島、暹羅、中南半島、華南，共計 14 日的考察見學旅程³¹。

東嘉生 1928 年畢業於台北高校並進入台北帝大政學部史學科，1929 年申請轉科至政學科，1932 年進同校大學院繼續研究，1933 年受聘為文政學部副手，1937 年任講師，1943 年 2 月升任助教授³²，1943 年 11 月回台途中遇難³³。

²⁸ 黃紹恆〈張漢裕教授學術源流考〉(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2001 年)。

²⁹ 如邱永漢所言，北山轉任東京帝大教職後，以其與台灣的淵源，對來日求學的台灣學生極為親切、關心(邱永漢《わが青春の台灣 わが青春の香港》中央公論社，1994 年 8 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對日本失去自己曾經生活 10 餘年的台灣，在情感上感到無限的嘆息(鹽見俊二《終戰直後の台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新聞社，1979 年 12 月，21-22 頁)。此外，投降後的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在師資上曾有很大的更動。北山雖經日本政府「中央教職員適格審査委員會」審定合格，但是其於結果發表前便提出辭呈，於 1947 年 1 月 11 日正式辭去東大教職(《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經濟學部》138 頁)。根據前引鹽見書，北山後來曾任教於學習院大學。

³⁰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 198 號(1938 年 6 月 15 日)。

³¹ 〈南支南洋を檢討十四日台灣に歸る〉(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6 年 11 月 9 日)。

³²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 56 號(1932 年 4 月 30 日)、同前第 79 號(1933 年 4 月 30 日)、同前第 306 號(1943 年 2 月 28 日)。

東堪稱台北帝大的培養的少數幾位社會科學學者之一，同時也清代台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先驅。東的研究生活可說起自進入大學院，根據《台北帝大學通則》規定可知，大學院以接受學部教師的指導進行學術研究為目的（第 36 條），大學部畢業生經教授會審查通過即可入學（第 37 條），無修課或筆試等負擔，但可在授課老師的同意下聽課（第 39 條）³⁴，可說為將來以研究為職志的學生提供一個自由學習的環境。也因此考核其學習成果及判斷是否適合就職任教之基準，便是其研究發表的情形。東在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大學院的研究課題為「經濟學——特別是以殖民地的經濟為中心的研究」³⁵。

東在大學院的時間只有 1 年，1933 年 4 月為擔任同大學的「副手」工作而申請休學。台北帝大的副手設置於 1930 年 1 月，根據「台北帝國大學規程」可知，副手的工作執掌完全與助手相同，最大的差別在於副手沒有正式的薪俸，但是實際上可從學校定期獲得津貼。這種差異可說純粹出於制度上的限制，其理由在於「台北帝國大學官制」第 1 條載明助手為「判任官」，即國家的公務員，台北帝大的助手員額為 63 人。1933 年，東任副手之時，文政學部的助手有 5 人、理農學部 42 人、附屬植物園 2 人、附屬農場 5 人、醫學部 11 人，合計 65 人，已經超過法定的額度³⁶。對東而言，擔任副手一職後，除可因此獲得固定的薪資收入（每月津貼 50 圓），而得以有較穩定的研究生活，更在於是其研究成果有刊載在台北帝大學報的資格。

由表 3 可知東的研究成果自 1934 年 5 月出版的《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開始，到 1937 年 5 月由副手轉任講師（每月津貼 1800 圓）為止，共發表了〈清朝治下台灣的土地所有型態〉（第 1 輯，1934 年 5 月）、〈馬爾薩斯的地租論——地租學說史的一斷章——〉（第 2 輯，1935 年 8 月）、〈清朝治下台灣的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第 3 輯，1936 年 11 月）。此三篇研究成果顯然是東得以轉任講師的最主要條件，其中第二篇與其他兩篇看似突兀，然而三者之間應可說仍有其環節相扣之處。

東在大學部的指導老師為政治學者堀豐彥，畢業論文題目為「政治性支配與殖民現象——殖民現象之本質——」³⁷。楠井在東的遺著所寫的〈跋〉中讚許其為人質性穩和，不與人爭，對友情

³³ 移川子之藏〈序〉（東嘉生《台灣經濟史研究》1944 年 11 月）。

³⁴ 《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3 年（1928 年 12 月）。戰後日本的大學亦設有大學院，不過此大學院已非戰前的大學院，而與台灣的大學研究所接近。惟在精神上，進大學院的目的係在於為將來作研究者作準備一點，則有相當程度地延續下來，此點與今日台灣學生就讀研究所主要在於追求較高學歷的情形，有若干的不同。

³⁵ 《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7 年版。

³⁶ 《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11 年版。

³⁷ 國立台灣大學藏台北帝大史料《學士試驗：口頭試驗科目屆、論文題目屆》。

甚篤。對自己如此極為不完美的人，仍能善守「弟道」。此處所言的「弟道」當可解為日文的「師弟之道」，即師生之道³⁸。因此，即使在形式上楠井可能不是東在大學院的指導老師，然而在實際的學習過程，對東顯然給予極大的影響。

東對殖民地現象的注意，由其大學部畢業論文題目可知開始甚早，而此可說亦是對自己所成長的環境——台灣——所抱持關心的一種投射。然而如何以理論來貫串，對以研究為終身志業的東而言，既為當面對又為無法規避的課題，而此課題卻是無標準答案又必須自己摸索的難關。戰前日本的學者在克服這種研究者必須經過的自我淬鍊階段，多半會認定「種本」，即選擇可讓自己的思想及研究得以出發並成長的經典著作並讀破之³⁹，翻譯多半是這種讀破經典的副產品之一⁴⁰，譯者的解題不僅是讀後心得而且也是研究成果。

於前述楠井隆三研究業績處，曾言及楠井與東曾合譯馬爾薩斯有關英國穀物條例的文章，楠井對此書的貢獻在於精密校對東的譯稿，其餘包括解題在內的撰寫完全由東負責。因此，楠井在整個翻譯過程及闡釋馬爾薩斯的見解上，當可說從旁指導及監譯的成分居多。

眾所皆知，馬爾薩斯在英國穀物法的存廢問題上，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而與站在新興資產階級立場的李嘉圖形成論敵的關係，東在此書的解題中對馬爾薩斯及李嘉圖的地租論作了相當程度的評述。雖說此地租論與台灣經濟史研究的關聯性，仍待今後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從東在《政學科研究年報》發表的前述兩篇文章（即〈清朝治下台灣的土地所有型態〉及〈清朝治下台灣的地租關係〉），似乎可說東的台灣經濟史研究係從地租論，即台灣的地主階層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除了這些研究成果的發表外，當然尚有一些平素參與的學術活動，例如於1938年2月15日的「政學研究會」定期聚會中，東曾經作了題為「台灣匪亂發生原因」的講演，亦可視為其研究成果的發表。另外，今日東傳世之研究文集可舉出《台灣經濟史研究》一書，係東於1943年11月23日在回台的航程上遇到美軍襲擊逝世後，由東的弟弟東日出男及楠井隆三將其遺稿及上課講義整理匯集成書的論文集。由該書前篇「台灣經濟史概說」的內容，可大致看出東對整個台灣經濟史的觀點與構想，東將到日

³⁸ 楠井隆三〈跋〉（東嘉生《台灣經濟史研究》1934年11月）。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7年10月18日題為〈台大出身初の講師秋永・東兩氏決る〉文中，則言東在楠井與北山的指導下進行研究。

³⁹ 「種本」一辭見諸故東京大學大內兵衛教授所著《經濟學五十年史 上》（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8月）。

⁴⁰ 例如矢內原忠雄在其殖民地地理理論的研究過程中，曾翻譯過J.A. Hobson的《帝國主義論》（1951-52年，岩波文庫）。大塚久雄在研究西洋經濟史時，則譯有韋伯的《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62年，岩波文庫）。受矢內原及大塚影響極深的張漢裕則有T. Mun的《帝國主義論》（1942年，岩波文庫）、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968年，臺灣銀行）等。

治時代為止的台灣經濟史區分成「氏族共同經濟時代（荷治時代之前）」、「原始掠奪經濟時代（荷治、鄭氏時代）」、「封建經濟時代（清代）」、「資本主義經濟時代（日治時代）」。

東運用許多台灣總督府的調查資料，並由此所描繪出的台灣經濟史圖像，已與戰後台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極為相近，雖說上述的時期區分仍有很大的商榷餘地，個別時期的研究亦有明顯的不足⁴¹，但是在近代台灣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的發展上，仍應給予正面的評價。

3 政學科學生的學習與就業情形

台北帝大於 1928 年 4 月正式開校，然而到同年的 2 月下旬，相關法令所有立法程序卻仍未完成，使得將於當年 3 月上旬畢業的台北高校學生感到無比的焦慮，不知是要在期限內申請日本國內的大學，還是要等在 4 月可能會開學的台北帝大⁴²。根據《台北帝國大學通則》關於大學部學生的規定，具有入學資格的學生依序為高等學校高等科畢業生、學部所舉辦之臨時入學考及格者（第 4 條），如果仍有餘額時才允許非高校系統的學生經「選拔」入學（第 6 條）⁴³。換言之，台北帝大與日本國內的帝國大學同樣給高校學生免試入學的「先入權」。至於非高校畢業生（主要是屬於職業高等學校畢業生），即當時有所謂「旁系出身」之稱的學生，則必須經考試等方式才得以入學⁴⁴。

由表 4 的統計資料可知，雖說 1928 年 3 月的台北高校學生對是否要申請新設的台北帝大感到困惑，但是實際上台北高校的學生還是跟日本國內其他的高校學生一樣，對歷史最悠久的東京帝大及京都帝大「情有獨鍾」。因此，台北帝大的政學科乃至整個文政學部，「旁系出身」的學生始終佔有一定比率，1938 年度後更出現超越高校畢業生的情形，惟根據研究，此現象與該年度起專門學校畢業生就讀帝大的限制廢除有直接關係⁴⁵。

如再對照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自 1937 年起至 1943 年皆舉辦「第二次募集」之事實，除可推知此開放政策與該校招生不易有密切關係外，亦間接說明當初為容納台北高校畢業生而設立台北

⁴¹ 例如時任台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所長移川子之藏便指出東嘉生有關原住民（當時稱為「高砂族」）的理解失之泛論及嚴重不足（移川子之藏〈序〉《台灣經濟史研究》）。

⁴² 〈卒業期を前にして台灣高校迷〉（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28 年 2 月 27 日）。

⁴³ 《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3 年（1928 年 12 月）。

⁴⁴ 事實上，如果帝大的入學以入學考成績為標準的話，這些致力於升學考而勤奮準備的「旁系出身」學生，競爭能力可說超出高校畢業生許多（〈高校卒業者先入權五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0 年 12 月 8 日）。

⁴⁵ 所澤潤〈專門學校卒業者と台北帝國大學—もう一つの大學受験世界〉（近代日本研究會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19》山川出版社，1997 年 11 月）。

帝大的大義名分未必充分達成。反倒是為職業高等學校的畢業生，提供另一個進入帝國大學窄門的機會。另外於 1941 年「豫科」的設置，主要目的也是在確保入學的學生人數。

諸此種種情形，儘管在籌設階段，參與者對台北帝大寄與多大深厚的期望，然而在校畢業生可自由選擇就讀學校的情況下，位於「大日本帝國」邊陲地區的台北帝大，對他們而言似乎並非具吸引力的選擇，即使台灣人的高校畢業生亦復如此。1936 年度來台擔任「社會政策」教席的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便觀察到這種現象，「本島人的內地留學之欲求，委實熾烈…如此一來，由於台北帝大的入學者人數亦出現減少的傾向，目前為該大學的煩惱」⁴⁶。

總而言之，雖為帝國大學，然無論就學校規模或是學生人數而言，台北帝大無法與日本國內的老牌帝大相比。河合的「社會政策」聽講學生，至多 15 人，少則 5、6 人⁴⁷。文政學部史學科出身，故日本天理大學中村孝志教授亦回憶由於入學人數少，政學科以外的文史哲 3 學科大多只有 2、3 人聽課而已，然而師生關係卻因此反而更加密切⁴⁸。不過，亦有如 1937 年入學的辜振甫，因繼承家中的事業，不常到校上課的特例⁴⁹。

不過，文政學部雖再分設哲、史、文、政等 4 個學科，但是政學科的學生人數始終超過其他 3 個學科許多，當時學生重視「現世利益」的態度，可謂清晰易見⁵⁰。此點由學生所提出的畢業論文題目與經濟時事有相當程度貼近的情形亦可看出端倪，表 5 所列為政學科學生所提畢業論文當中與經濟有關的部份資料。

文政學部的上課情形及校園的氣氛，仍需進一步的史料出現，方可窺知一二。不過，開校後的台北帝大的確也曾經出現過「校園民主」之類要求校務改革的風潮。

松本巍所撰的《台北帝大沿革史》敘述創校之初，學部長的權限非常大，尤以文政學部更是如此。於是，該學部的教師於 1931 年底將當時學部長村上直次郎排除在外，連日召開教授會，目的在提高教授會權限以增進大學的自治權。而學校當局與台灣總督府教育當局對此情形，則是「毋寧採取消極態度，對於問題

⁴⁶ 〈台灣の旅（1）内地へ憧れ潑辣たる本島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6 年 2 月 17 日）。

⁴⁷ 〈台灣の旅（1）内地へ憧れ潑辣たる本島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6 年 2 月 17 日）。

⁴⁸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台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不僅是文政學部，1944 年就讀農學部的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佳山良政，亦表示他們經常是晚飯吃完，又跑回老師的研究室聊天或學習到很晚（佳山良政《台北帝大生—戰中の日日》築地書館，1995 年）。1943 年畢業於史學科南洋史專攻的田中則雄回憶當時的上課是一對一的教學，與老師可說是朝夕相處（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帝大的生活》1999 年 11 月，54 頁）。

⁴⁹ 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帝大的生活》（1999 年 11 月）46 頁。

⁵⁰ 台北帝大開校時期，日本國內雖瀰漫著高學歷「就職難」的低迷狀況，志願法學部及經濟學部的學生人數，卻未見明顯減少，其原因在於前者有大政治家、後者有大實業家的遠景可期（〈千三百の高校卒業者が帝大に入學出來ぬ〉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29 年 9 月 16 日）。

的解決聽其自然，不加以任何折衝」。雖然，村上到翌年（1932）的6月27日才「依願免職」，但是新任學部長安藤正次係由教授會選出，一改以往由校長推薦，台灣總督任命指派的慣例⁵¹。松本並未說明學校及台灣總督府態度「寬大」的理由，不過考諸日本國內帝大的實情，文政學部的要求既然已為日本國內大學既有之制度，或許才在當權者的容認範圍內。

理農學部似乎未參與此次文政學部教授的活動，不過於1934年1月以學部長大島金太郎的去世所衍生出來的繼任問題，該學部教師亦提出3大訴求，要求自主權。此3大訴求為（1）學部長依選舉方式產生、（2）仿造國內各大學的退休制度、（3）大學教授免兼台灣總督府職務，以維持大學的研究水準。當時理農學部的25名教師，有10名兼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及工業部技師，對在校的教學及研究造成不小的困擾⁵²。台北帝大與台灣總督府是否全盤接受，不得而知。不過，大島的繼任者青木文一郎的確亦經由教授會選出，而且整個氣氛據言為之一變民主⁵³。

不過，台北帝大內部要求改革或是重建的聲浪，似乎也未因兩學部的訴求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而中斷過，其中又以文政學部的教師最為積極。影響所及，學生亦受此氣氛感染而有所行動。1935年2月15日，以文政學部學生為中心的40名台北帝大學生，群聚於學校附近的水源地舉行長達2小時餘的學生大會，所達成的協議，除對外宣示台北帝大學生勤奮學習，「高等文官試驗」的成果絕不亞於其他大學外，同時指出台灣社會的積弊就是「本土輕視主義」，亦決定對校長提出改革文政學部的聲明書⁵⁴。

該請願書於翌（16）日在相同地方公開發表，文中對文政學部，特別是政學科的問題有直接的指陳。

1935年2月16日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學生聲明書

我帝大之使命在於帝國南方政策，作為殖民地大學，以其指導性的地位，對台灣的社會文化有所貢獻的同時，亦在於進一步確立向南洋、華南發展的基礎。此使命的完成，固然有待大學當局與吾輩學生的覺醒及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社會一般必須對此使命有所認識，積極地協助帝大的改善與充實，然而社會對我帝大的態度甚為冷淡。舉其一例，就畢業生的就職狀態而言，對

⁵¹ 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23頁。繼安藤任學部長者為今村完道，今村之後為矢野禾積，皆為3年一任，可判知除選舉制外，任期制可能也是成果之一。

⁵² 〈台北中堅教授學制改革を叫ぶ〉（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4年2月5日）。

⁵³ 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24頁。

⁵⁴ 〈偷安の夢を破る台大改革の烽火政學科學生奮起す〉（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5年2月25日）。

我政學科畢業生的態度，可說尤其是閉鎖。其門戶閉鎖的原因，世人往往指摘我帝大的種種缺點，例如我帝大的內容極不完整，特別是政學科鮮少有才能的教授，講座數亦寡，而此指摘更進一步舉出申請入學者人數極少。對帝大過小的評價，甚至到了因為是免試入學所以學生的素質云云之類的程度。這些當可視為門戶閉鎖的主要論據。

然而充當政學科的經費，與其他比較極為小額。以此有限的預算，教授無法鑽研、講座數不足的情形，不得不說理所當然。只以學生人數多寡來決定大學品質是否良好，吾人不得不表示反對。申請就讀台北帝大的人數之所以僅少，雖有本大學的不完備外，主要原因不也在於一般台灣社會的不滿、對內地各大學存在著模糊的憧憬及虛榮？

要言之，對政學科乃至文政學部存在價值種種非難的核心，雖在於對前述使命未能見到具體、有形的成果，但如前舉原因，只求諸各種外表上的缺點並不妥當。其責任的一半，必須了解到是社會的閉鎖態度。希望世人不要只被外表上的缺點所眩惑，確保育成大學的信念，並對吾人努力的成果有所期待。

出處：〈偷安の夢を破る台大改革の烽火政學科學生奮起す〉（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5年2月25日）。

由文中內容可知政學科畢業生的就業，遭遇到外界的「閉鎖」的態度，因此可判知整體狀況並不理想。雖然，在第1天的會議中，台北帝大學生自認在日本政府「高等文官試驗」的表現上並不輸給其他的大學，但是如前節所述，台北帝大的課程中由於沒有開設所需的相關科目，對高校學生的吸引力不大，由表6所列戰前台北帝大出身學生「高等文官試驗」及格的名單，自1931年3月第1屆學生畢業起，只有10名及格，人數確實不能算多。

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畢業生就在職的取向上，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由傳統經由國家考試（「高等文官試驗」）進入政府官僚體系，逐漸擴張到民間的企業組織。然而，台北帝大開校的日本經濟，正好處於第1世界大戰後慢性不景氣的高潮，即所謂「昭和金融恐慌」的風暴中，社會上已然出現連大學畢業生亦一職難求的狀況，連帶創立不久，知名度不高的台北帝大畢業生也受波及，所得到的待遇或許就是上述所謂的「閉鎖」態度。

大學當局對學生的就業情形當然甚為關心，畢業學生就職情況如果不佳，立即會反映到招生的狀況，進而影響的學校的聲譽乃至研究教學的營運。政學科學生的就職志向，由表7所列有限的大學當局調查資料，約略可看出政府機關還是台北帝大學生的第一志願。不過，除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關居首位外，其次尚可

看到朝鮮、「滿洲國」等當時為日本外地的統治機關，然後再是僅少的民間企業或是學校等其他。

實際上，台北帝大學生，尤其是政學科學生在就職條件上，根據 1933 年 6 月文部省告示第 251 號規定，只要學士畢業考試及格，同時修過憲法、行政法、經濟學（或經濟原論）、民法、刑法、財政學、經濟政策、東洋倫理概論、法律哲學、政治學、政治史中的任何 2 科目，即可免試取得在高等學校擔任「法制及經濟」課程的教師資格⁵⁵。不過，相對哲、史、文 3 學科的學生，政學科的學生似乎很少利用這項優待，上述所述的志願情形，反而為大多數的情形。

其次，學生認為台北帝大之所以不受社會的評價，甚至因免試入學，使得台北帝大學生被投以質疑的眼光，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社會不重視本土的積弊所導致的冷淡態度。特別是政學科的預算極少，因而教師無法專心鑽研學問，講座數目亦顯不足。

要言之，此聲明書反映出台北帝大未能獲得台灣總督府等政府機關的重視，亦未能有具體而明顯的研究成果，加上課程的設計未能配合國家考試的要求，學生的就職情況不佳，於是愈發不易招收到學生，使得與辦學績效無法改進等的互為因果關係的現象出現。只是，此聲明書未提出具體的要求，同時限於資料，無法得知在台北帝大校園回應的情形，不過在當時日本已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日本國內法西斯勢力已然抬頭的情況下，在殖民地台灣有如此的學生活動，倒也值得一書。

不過，此後台北帝大學生的就職情形似乎仍未有明顯改善。1937 年 1 月，日本經濟因軍事需求刺激了經濟的復甦，除了文學部外，日本國內的帝國大學理工法經畢業生的就業狀況變得非常熱絡，但是同時期台北帝大預計於 3 月畢業的 24 名文政學部學生、11 名理農學部學生中，只有各 1 名的學生找到工作⁵⁶。

1937 年末，台北帝大趁著為新設的醫學部編列預算的方便，以文政學部計畫整頓現有的講座、增設商法及社會學的講座為由，增列文政學的相關預算，然而結果以經濟學為始的各項要求悉數被刪⁵⁷，此舉引起了政府當局要廢除畢業生就職不易及學生人數減少的文政學部之臆測。1938 年 2 月，第 2 任校長三田正則就文政學部存廢的問題，親自前往文部省法制局陳述並協調文政學部的改革問題。結果，在文部省法制局、拓務省亦參與檢討的情況下，所獲得的結論是台北帝大應發揮台灣的特殊性，以培養

⁵⁵ 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 85 號（1933 年 7 月 31 日）。

⁵⁶ 〈就職前線展望〉（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7 年 1 月 11 日）。

⁵⁷ 〈文政・理農兩學部新規要求全減／台北大明年預算大斧鉞〉（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7 年 11 月 22 日）。

執行日本「南進政策」人才為文政學部的改革方向⁵⁸。換言之，縱使台北帝大本身有意廢除文政學部，然而為配合日本政府的國家政策，以拓務省為代表的中央機關，未必會表示贊同。特別是所謂「時局」上的需求，使得過去台北帝大經常提到在日本向華南及南洋的勢力擴張上，負有重大使命的自我期許，似乎可說由此才開始獲得國家正式的認同與支持。同時，此亦意味著無論是研究或是教學，文政學部的營運進入不得不配合著國家政策的階段，其作為追求學術的角色則逐漸後退湮滅。

4 戰時及戰後初期的台北帝大生

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台北帝大自然無法免除其所給予的影響，最明顯的便是學生的修業年限縮短及因徵調入伍的學業中輟。

台北帝大的學生，除台灣人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外，其他日本人則大多以緩徵的方式就學。然而，隨著戰局對日本逐漸不利，大學也無法自外於日本的戰時體制。軍部首先於 1941 年 6 月宣布縮短大學生的緩徵期限，文部省為配合此政策亦下令縮短大學的修業年限⁵⁹。台灣總督府依此政策，於 1941 年 10 月 28 日以府令第 214 號、同年 12 月 24 日府令第 250 號，宣布縮短在學及修業年限⁶⁰，於是，自 1942 年開始，學生的入學與畢業的時間出現參差不齊的情形。捲入戰爭漩渦中的台北帝大學生在學期間雖依法縮短到為 2 至 3 年，實則是被迫中輟學業。為配合「時局」需求，招生的辦法亦隨之有所改變。

文部省曾頒布「昭和十九年度大學、高等學校及專門校入學者選拔方針」，於該文開頭，便開宗明義宣示：「基於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學生之勤勞動員將越加強化，因此要全部履修所定學科課程變得困難。為使學生安心從事國家所要求的勞動，不致徒然浪費精力於入學考試的準備上，以致欠缺對決戰非常時局所必須的強化生產國策之貢獻」，因此以選拔的方式決定入學資格，招收預定於 1944 年 10 月入學的新生。選拔以申請者畢業學校校長為名義所發行的調查書為基礎，再考核學生的學習成績及品行操守⁶¹。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同年度的招生方式依上述方針，將申請者

⁵⁸ 〈文政學部の廢止問題俄然台北大に再燃／今秋學制改革を斷行か〉(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8 年 6 月 27 日)。

⁵⁹ 東京大學《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一 經濟學部》130 頁。

⁶⁰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昭和十六年度分》264 頁。

⁶¹ 國立台灣大學藏《學生募集關係書類》。以下所敘述有關 1944 年 10 月入學的說明，皆引用此資料。

分成先後 2 個順位分次招生，即第 1 次招生：高等學校高等科及學習院高等科畢業生，第 2 次招生：高等學校高等科、學習院高等科畢業生及專門學校（包括同等以上的學校）。第 2 次招生系因第 1 次招生仍無法招收足額學生時才舉行。所定招生名額為哲學科 20 名、史學科 15 名、文學科 15 名及政學科 50 名。1944 年 6 月底，文政學部直接行文台灣總督府東京出張所，附上「學生募集要項」、「入學願書用紙」、「台北帝國大學通則」、「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等資料，請求代為在日本國內招生。所開列的招生學校種類，包括官公私立高等學校 33 所、官公私立專門學校 53 所。

此年度文政學部的第 1 次招生，值得一提的是哲學科及史學科唯一的合格者皆為女性，前者為林こずゑ（原名林素琴，新竹州籍，東京女子大學高等學部畢業），後者為長谷川ミエ（原名張美惠，台北州籍，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畢業）。政學科合格的 24 名學生中，包括台北帝大豫科在內的官立高校畢業生僅 8 人，第 2 次招生則全無這類學生，台北帝大不易招到其所列第一順位的高校學生之情形依然如故（參照表 8）。此屆新生有相當多是在錄取之前，便已被徵召入伍。台北帝大教學受到戰爭破壞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尚有以所謂「假卒業」（暫定畢業）認定學生的招生方式。以 1944 年為例，「假卒業」的資格申請為預定於同年 9 月畢業但已經入伍、入團的高等學校及專門學校（或同級學校）畢業生。他們可由家人代為申請就讀台北帝大，當然大學亦需經過審查的手續決定是否合乎入學條件。1943 年度這類學生佔招生名額，1944 年度則在員額之外。

即使未受徵召，在學學生的學習亦受「時局」的影響，諸如所謂「勤勞奉仕作業」的義務勞動，經常打斷正常的授課。早在 1941 年大學當局便打算運用學校正門前的 2000 坪空地，設置菜園並要求全校員生義務參與種植工作⁶²。除此之外，尚有軍事訓練。根據 1944 年 3 月 6 日文政學部的軍訓要領，每週訓練 4 小時，7 月 1 日起 1 週在新竹湖口進行野外演習，8 月除海軍及兵器方面外，尚有步兵、重兵器、野山砲、航空方面的特別訓練。實施對象則為所有在校學生⁶³。

至於教師方面，政學科的經濟學第一講座及第二講座，除第一講座尚缺 1 名助手外，其他並無因徵召入伍而缺員的情形，因此經濟學方面的授課基本上可說照常進行。

前節曾言及於 1938 年，文政學部可說以配合日本政府的南

⁶² 〈二千坪の空閑地を利用〉（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41 年 4 月 28 日）。

⁶³ 國立台灣大學藏《揭示錄 自昭和十九年二月》。

方政策，才免去被廢除的「危機」，爾後配合著整個日本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力量的向外擴張，台北帝大在研究方向上，比從前更為明顯地發揮台灣在日本版圖上所具地緣特色之情形。

1939年6月，日本國內的「太平洋學術協會」調查部長山田文雄，來台尋求台灣分會設置的可行性。台北帝大校長三田正則率領文政學部及醫學部20餘名教授及研究者，於台北鐵道飯店與之進行懇談，最後雙方達成合作協定，三田並兼任該協會台灣分會的分會長⁶⁴。

其後，台北帝大亦計畫於1942年度設立南方文化研究所，以推動所謂「南方」各地區的人文科學綜合研究。以華南、南洋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教育、思想、風俗、民族、語言等各項為研究課題，預算金額100萬圓，專任教授3名、助教授若干名、助手10餘名，並採取約聘非本校人員之「囑託制」。該研究所成立之後，不僅計畫與日本的「南方協會」、「善鄰協會」各財團，更打算與越南河內的遠東學院進行共同研究⁶⁵。

惟台北帝大的這項構想，要到1943年3月以台灣總督府敕令第214號發布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官制才正式成立。台北帝大同時還成立了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⁶⁶，再加上已設立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戰時體制下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體制可說已然完成。

南方人文研究所再根據同年4月3日制定的「事務分掌規程」，下分第1部、第2部、庶務係等3部門。第1部研究華南、南洋的政治及法制、財政及經濟，第2部則為同地區的文化、民族⁶⁷。表9所示，則為1945年11月8日時點台北帝大移交給中國政府時之情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雖宣佈投降，但是在台灣，到同年10月25日之前，台灣總督府仍然有效地統治台灣。台北帝大則到同年11月15日移交之前，依然維持自成立以來的運作，只是眼前最重要的業務，則是戰後的善後、帝大業務的結束與移交。

首先，於1945年有2次的學生畢業，第1次於該年9月25日，第2次於11月14日。總計自開校以來至1945年11月14日為止，文政學部總共有466名的畢業生，其中政學科學生即佔了313名，為全員的67.2%。

⁶⁴ 〈南太平洋へ進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39年6月19日)。

⁶⁵ 〈南方文化研を設立／台北大共榮圈內學會と連絡〉(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41年11月10日)。

⁶⁶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以華南、南洋資源的開發、改良、利用等綜合科學研究為任務，分成第1部、第2部、實驗所、庶務等4部門。第1部進行農林作物、家畜改良、品種改良的研究，設立時以棉及其他纖維的調查為主要工作。第2部則為農林資源的加工製造、農藝化學的研究為內容。試驗所則設於研究對象所在地點，以研究當地農作的發育、生產率、害蟲驅逐等各項課題(〈台北大に二研新設〉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新聞》1943年3月22日)。

⁶⁷ 國立台灣大學藏《台北帝國大學移交檔案》。

另外，未達畢業標準的學生，所必須做的就是日本人學生的返日轉學。1945年12月11日，台灣總督府文教局教學課長松山儀藏以公文方式，要求台北帝大將希望回日就學的學生造冊提報。該份公文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所使用的年號為「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明白顯示此時的台灣已為中國政府所管轄，松山的官銜亦因此冠上「元」（即中文的「原」）。另外，公文開頭處寫道：「希望歸還內地的內地人學生、生徒」，此語可理解為此時點台北帝大的日本人學生如果願意，仍能留在台灣完成學業。

根據鹽見俊二〔即日本宣布投降後，立即來台與中國政府折衝，協助台灣總督府處理善後事宜的大藏省官員〕所見，於10月陳儀尚未來台之前，在台的日本人皆因聽到由陳的秘書長葛敬恩所傳達台灣省政府之方針：「對現狀不作根本性的變革、尊重教育及技術、台灣雖為中央政府下的地方組織但與中國本土的省份不同、中國銀行券與日本銀行券暫時併用」等各項，錯誤地判斷即使中國政府來台，台灣的現狀大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加上日本國內可想見到的糧食短缺、就業困難等問題，一時之間想要繼續留在台灣的日本人相當多。當時台灣總府官員也認為，至少可允許在學的學生繼續留在原校完成學業。但是，10月底陳儀來台之後，過去幾個月等候中國政府來台的平穩生活為之消失。首先，台灣社會的通貨膨脹現象日漸嚴重，在台日本人的生活狀況開始惡化。到了12月，台灣的報紙報導在菲律賓及日本的台灣人受到日本人欺壓，台灣社會對日本人的態度明顯改變。另外，陳儀政府徵用日資企業導致許多日本人失業者，日本人經濟活動受阻進而造成在台日本人全面的窮困化。再加上台灣社會治安趨於惡化、米價自1946年1月底開始暴漲、同年2月開始有日本人遭到逮捕，諸此種種狀況，使得在台日本人逐漸改變原先繼續留台的想法。當然，中國政府除留用人員及家屬外，不准在台日人繼續在台的政策方針，亦使他們不得不返回日本⁶⁸。

因此，台北帝大的日本學生，由於上述主客觀因素，最後還是必須返回日本。不過，松山的公文以發出的時間而言，是為了配合日本文部省將於翌（1946）年1月分發返國學生轉學的政策而來。從返國學生名冊可知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的學生分成從軍入伍學生及在校學生兩類，特別是後者的經濟狀況普遍困難，縱使被允許留台就學，恐怕也會因經濟問題而無法繼續⁶⁹。

就台北帝大的經濟學而言，不僅學生悉數回日，兩個講座的教師亦未被留用，文政學部亦未培養出台灣人的經濟學研究人

⁶⁸ 鹽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の台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新聞社，1979年12月）。

⁶⁹ 國立台灣大學藏《民國三十四年歸還關係書類 文政學院》。

才，空留圖書館裡的經濟學書籍。戰後，國立台灣大學的經濟學系及經濟學研究，勢必從頭摸索其發展的道路。只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冷戰情勢，在台灣發展自己的經濟學研究時，給予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表 1 台北帝大經濟學講座研究教學人員表

| 資料之時點 | 文政學部長 | 教授 | 助教授 | 講師 |
|-------------|------------------|------------------|-----------------------------------|---|
| 1928年12月25日 | 藤田豐八(1928年3月上任) | 小山田小七(經濟學講座) | | |
| 1929年12月20日 | 村上直次郎(1929年4月上任) | 小山田小七(經濟學第1講座)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2講座) | 今西庄次郎(財政學) |
| 1933年7月22日 | 安藤正次(1932年6月上任)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史、金融論) 今西庄次郎(經濟政策) | 土方成美(東京帝大教授、財政學) |
| 1934年7月30日 | 今村完道(1934年6月上任)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史、金融論) 今西庄次郎(經濟政策) | 三田村一郎(九州帝大教授、財政學) |
| 1935年8月1日 | 今村完道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史、金融論) 今西庄次郎(經濟政策) | 三田村一郎(九州帝大教授、財政學) |
| 1936年7月15日 | 今村完道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史、金融論) 今西庄次郎(經濟政策) | 東畑精一(東京帝大教授、農業政策) 汐見三郎(京都帝大教授、財政學) 河合榮治郎(東京帝大教授、社會政策) |
| 1937年8月15日 | 矢野禾積(1937年6月上任)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及第2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 東嘉生(社會政策) 津下剛(農業政策、經濟史) |

| | | | | |
|------------|----------------------|--|-----------------------------------|----------------------------|
| 1938年7月20日 | 矢野禾積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及第2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 東嘉生(社會政策) 津下剛(農業政策、經濟史) |
| 1939年9月末 | 矢野禾積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及第2講座) | 北山富久二郎(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 東嘉生(經濟史) |
| 1943年2月12日 | 岡野留次郎 (1942年3月上任)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 東嘉生 吉武昌男 | |
| 1944 |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小幡清金(財政學) | 吉武昌男 | |
| 1945 | 世良壽男 | 楠井隆三(經濟學第1講座) 今西庄次郎(經濟學第2講座) 小幡清金(財政學) | 吉武昌男 | |

出處：1928、1929及1933－1939年《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43年《學內通報》第306號

表 2 台北帝大經濟學講座相關課程一覽

| 學年度 | 課程名稱 | 每週上課時數 | 學分數 | 授課教師 | 修課年級 |
|------|------------------------|--------|-------|-----------------|-------|
| 1933 | 經濟原論 | | | | |
| | 經濟政策（農業政策） | 4 | 1 | 楠井隆三 | 1 |
| |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2 |
| |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2 |
| | 金融論 | 3 | 1 | 北山富久二郎 | 1、3 |
| 1934 | 經濟原論（高田保馬著《經濟原論》） | 3 | 1 | 楠井隆三 | 1 |
| | 經濟學史（亞當斯密以降古典著作的系統性研究） | 2 | 1 | 楠井隆三 | 無限制 |
| | 經濟史（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立及發展） | 2 | 1 | 北山富久二郎 | 1、2、3 |
| | 經濟政策（商業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3 |
| |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2 |
| | | | | | |
| 1935 | 經濟原論（高田保馬著《經濟原論》） | | 1 | 楠井隆三 | |
| | 金融論 | 4 | | | 1 |
| | 經濟政策（商業政策） | 3 | 1 | 北山富久二郎 今西庄次郎 | 1 |
| |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1、3 |
| | 財政學 | 2 | 1 | 三田村一郎 | 1、2 |
| | 社會政策 | | 1 | 未定 | |
| 1936 | 經濟原論 | | 1 | 楠井隆三 | |
| | 經濟學史 | 4 | 1 | 楠井隆三 | 1 |
| | 金融論 | 2 | 1 | 北山富久二郎 | 2、3 |
| |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 3 | 1 | 今西庄次郎 | 無限制 |
| | | 2 | 1 | 東畑精一 | 1 |
| | 經濟政策（農業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
| | 經濟政策特殊講義 | 2 | | | 2、3 |
| | | 1 | 河合榮治郎 | | |

| | | | | | |
|------|---|--------------------------------------|--------------------------------------|---|--|
| | (股票交易所的理論性研究) 社會政策 財政學 | | | 汐見三郎 | |
| 1937 | 經濟原論 社會政策 商業政策 經濟政策特殊講義 (工業金融、工業勞動問題) 財政學 經濟學史 農業政策 社會政策 | 4 2 2 4 2 | 1 1 1 1 1 | 楠井隆三 今西庄次郎 今西庄次郎 北山富久二郎 津下剛 東嘉生 | 1 2、3 2 2、3 2 |
| 1938 | 經濟原論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經濟政策(農業政策) 經濟政策特別講義 經濟學史 經濟史 金融論 財政學金融論演習 (戰時財政金融的研究) | 4 2 2 2 2 2 2 | 1 1 1 1 1 1 1 | 楠井隆三 今西庄次郎 津下剛 今西庄次郎 東嘉生 津下剛 北山富久二郎 北山富久二郎 | 1 1、2 1、3 1、2 2 1、2 1、2 2、3 |
| 1939 | 經濟原論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經濟政策(農業政策) 經濟政策演習(就工業政策的範圍) 經濟學史 經濟史(經濟史概說) 社會政策 財政學 | 4 2 2 2 2 2 2 4 | 1 1 1 1 1 1 1 1 | 楠井隆三 今西庄次郎 津下剛 今西庄次郎 東嘉生 津下剛 楠井隆三 北山富久二郎 | 1 2、3 3 無限制 2 1、2 2、3 無限制 |

| | | | | | |
|---------------------------------------|------------------------|---|-----|--------|-----|
| 1940 | 經濟原論 | | | | |
| | 經濟政策（工業政策） | 4 | 1 | 楠井隆三 | 1 |
| | 經濟政策特殊講義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1、2 |
| | （就工業政策的範圍）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1、2 |
| | 經濟學史（經濟學史概論） | 2 | 1 | 東嘉生 | 2 |
| | 金融論 | 2 | 1 | 北山富久二郎 | 1、2 |
| 1941 | 經濟原論 | | | | |
| | 財政學 | | | | |
| | 經濟政策（農政學概論） | 4 | 1 | 楠井隆三 | 1 |
| | 經濟政策（商業政策） | 4 | 1 | 北山富久二郎 | 1、3 |
| | 經濟學史 | 2 | 1 | 吉武昌男 | 1 |
| | 社會政策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2、3 |
| | 外國經濟書講讀（英語） | 2 | 1 | 東嘉生 | 2 |
| | 經濟學特殊講義（台灣經濟發展論） | 2 | 1 | 楠井隆三 | 2、3 |
| |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無限制 |
| | 2 | 1 | 東嘉生 | 1、2、3 | |
| 1944 年 3 月至 1945 年 3 月 | 經濟原論 | | | | |
| | 社會政策（戰時社會政策概說） | 2 | 1 | 楠井隆三 | 1 |
| | 商業政策（戰時配給上の諸問題） | 1 | 1 | 同上 | 2、3 |
| | 經濟學演習（工業政策的範圍，特別就勞務管理） | 2 | 1 | 今西庄次郎 | 2、3 |
| | 農業政策（農政學概論） | 2 | 1 | 同上 | 同上 |
| | 外書講讀 | 2 | 1 | 吉武昌男 | 1 |
| | 財政學 | 2 | 1 | 同上 | 1 |
| | | 2 | 1 | 小幡清金 | 3 |

出處：台北帝國大學《學內通報》第 79、103、128、150、172、196、219、241、264 號，國立台灣大學藏《授業關係書類》。

表 3 《政學科研究年報》經濟論文一覽

| 輯數 | 論文題目 | 作者 | 職位 |
|-----------------------------|--------------------------------|--------|-----|
| 第 1 輯 (1934 年 5 月出版) | 理論經濟學體系論－經濟學認識論之一齣 | 楠井隆三 | 教授 |
| | 「豐裕」的台灣財政 | 北山富久二郎 | 助教授 |
| | 清朝治下台灣的土地所有形態 | 東嘉生 | 副手 |
| 第 2 輯 (1935 年 8 月出版) | 台灣秤量貨幣制與我國幣制政策－「銀塊流通的金本位制」－ | 北山富久二郎 | 助教授 |
| | 馬爾薩斯的地租論－地租學說史的一斷章－ | 東嘉生 | 副手 |
| 第 3 輯 (1936 年 11 月出版) | 理論經濟學體系論－經濟學認識論之一齣 | 楠井隆三 | 教授 |
| | 銀行的創設信用與物價 | 北山富久二郎 | 助教授 |
| | 股票交易所的主力股票－我國新東京股市上市禁止的問題－ | 今西庄次郎 | 助教授 |
| | 物產交易所等級買賣之理論 | 同上 | 同上 |
| 第 4 輯 (1937 年 10 月出版) | 理論經濟學體系論－經濟學認識論之一齣 | 楠井隆三 | 教授 |
| | 何謂交易所 | 今西庄次郎 | 助教授 |
| | 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設與交易所－新設企業股票於交易所上市的時間－ | 同上 | 同上 |
| 第 5 輯 (1939 年 5 月出版) | 關於「穀物條例」的一場論戰 | 東嘉生 | 講師 |
| | 工業企業高額股息的抑制 | 今西庄次郎 | 助教授 |
| | 德川時代農村調查之一例－大村藩的「鄉村計」研究－ | 津下剛 | 講師 |
| 第 6 輯 (1940 年 9 月出版) | 明治初年的農書 附農業史三部作 | 同上 | 同上 |
| | 交易所作為套期保值機關的價值 | 今西庄次郎 | 助教授 |
| 第 7 輯 (1941 年 11 月出版) | 台灣經濟再編成論 | 楠井隆三 | 教授 |
| | 清朝治下台灣的地租關係 | 東嘉生 | 講師 |
| | 美利堅合眾國的農業金融組織 | 吉武昌男 | 同上 |

出處：《政學科研究年報》歷年版。

表 4 台北高校畢業生就讀文政學科領域情形及
台北帝大政學科學生出身類別

| 入學年月 | 東京帝大 | 京都帝大 | 台北帝大 | 合計 包括其他 大學 | 台北帝大 政學科 | | 同文政 學部 | |
|---------|----------|----------|----------|------------------|-------------|----|-----------|----|
| | | | | | 高 | 專 | 高 | 專 |
| 1928年3月 | 11 (0) | 10 (0) | 9 (0) | 31 (0) | 7 | 3 | 13 | 7 |
| 1929年3月 | 22 (4) | 19 (3) | 24 (3) | 72 (11) | 15 | 7 | 23 | 18 |
| 1930年3月 | 25 (3) | 17 (4) | 18 (5) | 68 (13) | 19 | 0 | 29 | 6 |
| 1931年3月 | 20 (3) | 27 (7) | 16 (3) | 73 (14) | 14 | 0 | 22 | 2 |
| 1932年3月 | 17 (2) | 22 (6) | 16 (4) | 62 (12) | 12 | 1 | 20 | 2 |
| 1933年3月 | 14 (1) | 26 (9) | 22 (5) | 69 (17) | 19 | 0 | 26 | 1 |
| 1934年3月 | 20 (3) | 26 (7) | 19 (7) | 71 (18) | 13 | 0 | 21 | 1 |
| 1935年3月 | 15 (1) | 28 (0) | 7 (1) | 67 (2) | 8 | 1 | 9 | 4 |
| 1936年3月 | 17 (1) | 21 (1) | 12 (3) | 64 (8) | 9 | 4 | 13 | 4 |
| 1937年3月 | 18 (3) | 23 (3) | 18 (2) | 63 (8) | 17 | 4 | 18 | 6 |
| 1938年3月 | 20 (2) | 21 (5) | 5 (0) | 55 (8) | 4 | 12 | 5 | 18 |
| 1939年3月 | 13 (3) | 22 (4) | 8 (0) | 55 (8) | 8 | 7 | 10 | 12 |
| 1940年3月 | 23 (4) | 20 (1) | 4 (1) | 53 (6) | 4 | 18 | 4 | 35 |
| 1941年3月 | 16 (2) | 33 (2) | 4 (0) | 62 (5) | 4 | 18 | 6 | 27 |
| 1942年3月 | 15 (2) | 19 (2) | 9 (0) | 51 (4) | 10 | 25 | 12 | 37 |
| 1942年9月 | 15 (2) | 21 (1) | 6 (0) | 50 (3) | 7 | 48 | 7 | 75 |
| 1943年9月 | 10 (1) | 28 (2) | 14 (1) | 69 (5) | 38 | 22 | 47 | 35 |
| 1944年9月 | 14 (0) | 25 (0) | 10 (0) | 54 (0) | | | | |
| 合計 | 305 (37) | 408 (57) | 221 (35) | 1089 (142) | | | | |

出處：由《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歷年版及《台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9年度）整理而得。轉引自所澤潤〈專門學校卒業者と台北帝國大學——もう一つの大學受験世界〉（近代日本研究會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19》山川出版社，1997年11月）的表2「台北帝大に入學した高等學校等と專門學校等の卒業生數」與表5「台北高校からの文政學部領域の進學先」。

說明：「文政學科領域」具體所指為法學部、經濟學部、文學部、商科大學。

「高」指高等學校畢業及台北帝大豫科修了，「專」指專門學校畢業。

（ ）內為台灣的人數。

表 5 政學科學生經濟相關畢業論文題目

| 入學年度 | 論 文 題 目 | 學生姓名 | 指導老師姓名 |
|------|--------------------------|-------|--------------|
| 1928 | 我國產業組織與中小商工業之金融 | 池畑敏夫 | 小山田小七 |
| | 公債與利率的關係 | 澀谷良一 | 同上 |
| | 恐慌論 | 鍾德均 | 同上 |
| 1929 | 中小商工業者問題 | 江里口徹男 | 今西庄次郎 |
| | 論股份有限公司之本質 | 戒能修 | 同上 |
| | 近代貨幣配給之傾向 | 溝越寬 | 同上 |
| | 台灣信用組合之現狀 | 森岡正 | 今西庄次郎、北山富久二郎 |
| | 零售業對百貨店之問題 | 中村富夫 | 今西庄次郎 |
| | 台灣物價指數之研究 | 土屋米吉 | 楠井隆三、北山富久二郎 |
| | 台灣糖業之地位 | 後藤義雄 | 今西庄次郎、北山富久二郎 |
| 1930 | 政治性支配與殖民現象－殖民現象之本質－ | 東嘉生 | 堀豐彥 |
| | 有關台灣蕃族經濟生活之考察 | 小森傳夫 | 北山富久二郎 |
| | 台灣的農民金融 | 井岩太郎 | 同上 |
| | 古典學派人口問題理論之發展 | 孫萬枝 | 楠井隆三 |
| 1932 | 對台灣農業之考察 | 平野計巳 | 今西庄次郎 |
| | 不兌換紙幣制度的歷史研究 | 飯田修二 | 北山富久二郎 |
| 1933 | 集團經濟與通貨膨脹－特別以我國目前的通膨危中心－ | 森吉直城 | 同上 |
| | 以利率為中心來看我國的金融經濟 | 堀井敏男 | 同上 |
| | 對有價證券的考察 | 庄野隆一 | 後藤清 |
| 1938 | 日華事變與物價統制 | 松崎一夫 | 北山富久二郎、楠井隆三 |
| | 日本戰時經濟的性格 | 中山辰雄 | 楠井隆三 |
| 1939 | 台灣移民村的研究 | 石牟禮毅 | 吉武昌男、楠井隆三 |
| | 對台灣鹽業的考察 | 片寄二 | 東嘉生、楠井隆三 |
| 1940 | 東亞共榮圈的產業再編問題－特別是過剩產業對策－ | 澤田嘉之助 | 今西庄次郎 |
| | 大陸通貨工作 | 蘇瑞麟 | 楠井隆三 |

出處：國立台灣大學藏《學士試驗：口頭試驗科目屆、論文題目屆》。

表 6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學生「高等文官試驗」合格一覽表

| 姓名 | 錄取機關 | 派屬機關 | 1945年8月 最終官歷 | 畢業年份 |
|-------|-------|-----------------|-----------------|------|
| 青木茂 | 台灣總督府 | 1934年、專賣局書記 | 台北州產業部長 | 1933 |
| 井上正弘 | 司法省 | 1934年、司法試補 | 軍務 | 1933 |
| 曾我與三郎 | 台灣總督府 | 1934年、文教局屬 | 軍務 | 1934 |
| 山分一郎 | 台灣總督府 | 1931年、專賣局雇 | 陸軍司政官 | 1931 |
| 若森倫次郎 | 台灣總督府 | 1934年、遞信部書記 | 新竹州產業部長 | 1933 |
| 酒井薰 | 台灣總督府 | 1937年、交通局書記 | | 1934 |
| 柳武雄 | 文部省 | 1936年、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 大東亞省調查官 | 1931 |
| 浦山公明 | 台灣總督府 | 1944年、鑛工局屬 | | 1944 |
| 川合山武憲 | 台灣總督府 | 1937年、新竹州顧 | | 1936 |
| 溝口芳彥 | 台灣總督府 | 1943年、專賣局屬 | | 1941 |

出處：秦郁彥《戰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11月30日）。

表 7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政學科學生就職志願一覽（部份）

| 預定畢業時間 | 學生姓名 | 就職志願順序 |
|------------|-------|--|
| 1934 年 3 月 | 安部信義 | 1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2 台灣總督府 |
| | 濱田薰 | 滿洲國官吏 |
| | 紙富義 | 1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地方政府亦可）、2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3 滿洲國大同學院 |
| | 簡建勳 | 1 台灣總督府、2 新竹州 |
| | 中村孝明 | 台灣總督府 |
| | 王燮村 | 1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文教局、鐵道部）、2 台北高等法院、3 台灣電力會社（或台灣銀行）、4 本大學之副手 |
| | 酒井薰 | 1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2 其他台灣總督府各局 |
| | 曾我與三郎 | 1 台灣總督府官房、2 同內務局、3 同警務局 |
| | 玉真達雄 | 1 台灣銀行、2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3 同專賣局 |
| | 田中豐 | 1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2 台灣電力會社 |
| 1935 年 3 月 | 飯田修二 | 1 台灣總督府財務局、2 台灣銀行、3 地方州廳、4 其他民間企業或政府機關 |
| | 石垣用大 | 1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2 島內其他的政府機關、3 日本國內或朝鮮的政府機關（民間企業或是華南、南洋、滿洲則無意願） |
| | 邱春桂 | 1 滿洲國、2 台灣的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3 台北州廳或高雄州廳、4 台北市市役所或屏東市役所、5 屏東郡役所 |
| | 林火鼓 | 1 台北州基隆市役所、2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3 三井物產會社台北支店或基隆出張所、4 中等學校教員 |
| | 林德旺 | 1 民間企業：電力會社、銀行、汽船會社、製糖會社、新聞社、2 官廳：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專賣局、殖產局、財務局、內務局、台北州廳、3 其他合適之處 |
| | 若杉治朗 | 1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2 同內務局 |
| | 後藤正毅 | 1 台灣總督府財務局、2 同內務局、3 台北州廳、4 銀行、新聞社、5 中等學校 |
| | 顏木生 | 1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2 民間企業（只要是位於島內而且具發展潛力之企業，不問其種類） |
| | 中山作三郎 | 1 島內官廳：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同專賣局、2 島內民間企業：大阪商船會社、台灣銀行、3 島外民間會社 |
| | 杉壽平 | 1 台灣總督府各部局，特別是內務局、財務局、2 台北州廳 |

| | | |
|------------|------------------------|--|
| | 森吉直城 | 1 三井物產會社、2 台灣銀行、汽船會社、3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4 同專賣局 |
| 1936 年 3 月 | 荒谷元八郎 | 民間企業（但是不考慮銀行、新聞社、保險會社） |
| | 張基炎 | 1 由於想繼續做研究，因此想找不相衝突的工作、2 民間企業 |
| | 花野宜夫 | 1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或內務局、2 滿洲國或南滿鐵道會社、3 台灣銀行或汽船會社 |
| | 加藤正 | 希望能留在學校，因為想有唸書的時間，絕對不去台灣銀行（欄外：儘可能是官廳） |
| | 石橋信之 | 1 台灣電力會社、2 台灣製糖會社或明治製糖會社、3 台灣銀行 |
| | 岩下正信 | 1 官廳：台灣總督府財務局、殖產局、官房法務課、2 民間企業：銀行 |
| | 川合山武憲 | 1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2 同專賣局、3 同交通局、4 其他企業 |
| | 河原健次郎 | 1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2 電力會社 |
| | 大村唯一 | 台灣總督府財務局 |
| | 大貫廉 | 1 官廳：台灣總督府財務局、同殖產局、2 民間企業：臺灣銀行、汽船會社及其他、3 島外：日本國內、朝鮮、南洋方面 |
| | 林水國 | 1 官廳、2 銀行、新聞社、保險會社及其他、3 滿洲國 |
| | 佐合鏗治 | 1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2 同財務局、3 同文教局、4 同警務局、5 電力會社、6 台灣銀行、7 淺野水泥會社 |
| | 島本博 | 1 台灣總督府各部局、交通局、專賣局、2 台灣電力會社、台灣銀行（希望能在台北就職，因為父親失業，必須負擔家計及籌措就讀醫專、中學及小學的 3 位弟弟學費） |
| | 山下正治 | 1 企業：大日本製糖會社、輕銀工場（高雄）、製紙會社、台灣電力會社、2 官廳：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內務局、3 滿洲國中央銀行 |
| 片山時秋 | 學校 | |
| 林田將臣 | 1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2 同文教局、3 學校 | |
| 1937 年 3 月 | 馮正樞 | 1 政學科副手、2 官廳：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及殖產局、民間企業：新聞社、製糖會社、島外：東京或滿洲國 |
| | 川添三郎 | 1 民間企業：台灣銀行、電力會社、汽船會社、製糖會社、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
| | 陳加溪 | 1 企業：台灣拓殖會社、製糖會社、新聞社、保險會社，特別是台灣拓殖會社、2 官廳：台灣總督府 |

| | | |
|------------|-------|---|
| | 林維吾 | 1 官廳：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同專賣局、同文教局、同鐵道部、拓務省、內務省、2 企業：台灣拓殖會社、電力會社、製糖會社、3 大學副手 |
| | 王江村 | 滿洲國、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灣拓殖會社、製糖會社、南洋方面、台灣電力會社及其他 |
| | 金江有智 | 1 企業：特別是台灣拓殖會社，其他企業亦無妨、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
| | 松尾正三 | 1 民間企業：銀行、電力會社、汽船會社及其他（特別是台灣拓殖會社）、2 官廳：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鐵道部及其他 |
| | 大歲德一 | 1 民間企業、2 官廳：台灣總督府專賣局、鐵道部、3 學校（雖有上述的順序，只要能被錄取，任何單位皆無妨） |
| | 林緒成 |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同內務局、台灣電力會社、台灣拓殖會社、新興製糖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台南州廳及其他、台灣銀行、台灣商工銀行、日本勸業銀行、南洋方面之企業 |
| | 黃國鎮 | 1 官廳：台灣總督府或地方州廳、2 民間企業：製糖會社、台灣拓殖會社（如果不得不去其他的企業，也只得去）、3 島外：滿洲國 |
| 1938 年 3 月 | 張松標 | 東京或大阪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 |
| | 原毅 | 1 新聞社（儘可能是日本國內）、2 製糖會社、3 銀行、4 電力會社、拓殖會社、5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
| | 林田將臣 | 學校、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同文教局、地方州廳 |
| | 戒能勇 | 1 台灣總督府官房、同文教局、同內務局、同殖產局、同財務局、營林所、2 學校、3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4 企業：台灣銀行、日本勸業銀行 |
| | 龜田良介 | 以民間企業爲止，官廳次之：1 台灣電力會社、製糖會社、2 銀行、拓殖會社、3 台灣總督府 |
| | 古波藏保勝 | 台灣總督府 |
| | 栗原進 | 台灣拓殖會社、台灣電力會社、製糖會社、台灣銀行、官廳 |
| | 中林正明 | 1 銀行、電力會社、製糖會社、2 台灣總督會社 |
| | 積島照 | 1 台灣拓殖會社、製糖會社、台灣銀行、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同殖產局 |
| | 吉岡正夫 | 只要是民間企業皆可，以台灣拓殖會社爲優先，其次爲電力會社、製糖會社 |

出處：國立台灣大學藏《自昭和八年至同十四年卒業豫定學生名簿並就職希望之調》。

表 8 1944 年 10 月文政學部招生結果

| | 第 1 次 招 生 | | | 第 2 次 招 生 | | |
|-----|-----------|------|------|-----------|------|------|
| | 招生人數 | 申請人數 | 合格人數 | 招生人數 | 申請人數 | 合格人數 |
| 哲學科 | 20 | 1 | 1 | 19 | 7 | 5 |
| 史學科 | 15 | 1 | 1 | 14 | 3 | 3 |
| 文學科 | 15 | 2 | 0 | 15 | 5 | 3 |
| 政學科 | 50 | 33 | 24 | 26 | 27 | 19 |
| 合計 | 100 | 37 | 26 | 74 | 42 | 30 |

出處：國立台灣大學藏《學生募集關係書類》。

表 9 移交前夕的台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1945 年 11 月 8 日）

| 擔任科目 | 學 歷 | 官 職 | 姓 名 |
|--------------|--------------------------------|------------------|-------|
| 歷史、文化 | 1918 年東京帝大文科學部畢業，文學博士 | 所長 台北帝大教授 | 桑田六郎 |
| 第 1 部 | | | |
| 財政、經濟 | 1923 年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 | 第 1 部長 台北帝大教授 | 小幡清金 |
| 財政、經濟 | 1924 年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楠井隆三 |
| 政治、法制 | 1924 年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園部敏 |
| 財政、經濟 | 1928 年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今西庄次郎 |
| 歷史 | 1934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助教授 | 箭內健次 |
| 民族、文化 | 1931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助教授 | 馬淵東一 |
| 財政、經濟 | 1927 年京都帝大文學部畢業、1936 年同大學農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助教授 | 吉武昌男 |
| 財政、經濟 | 1936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助手 | 加藤正 |
| 第 2 部 | | | |
| 教育 | 1917 年京都帝大文科學部畢業，文學博士 | 第 2 部長 台北帝大教授 | 伊藤猷典 |
| 文化 | 1919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力丸慈圓 |
| 文化、語言 | 1918 年東京帝大文科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淺井惠倫 |
| 文學 | 1921 年京都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神田喜一郎 |
| 歷史 | 1925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岩生成一 |
| 文化 | 1924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教授 | 後藤俊瑞 |

| | | | |
|------------|--------------------|---------------|-------|
| 文化 | 1926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所員 台北帝大助教授 | 藤澤苜 |
| 語言 | 1936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助手 | 二瓶重直 |
| 歷史 | 1940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助手 | 江本傳 |
| 語言 | 1941 年東京帝大文學部畢業 | 助手 | 仁平芳郎 |
| 囑託 | | | |
| 民族學研究 | 1914 年芝加哥大學畢業，博士 | 大學講師 | 移川子之藏 |
| 宗教 | 1928 年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畢業 | | 宮本延人 |
| 政治 | 1931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九州帝大助教授 | 秋永肇 |
| 法制 | 1932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大學講師 | 山下康雄 |
| 中文文獻翻譯 | 1933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 神島倉吉 |
| 社會調查 | 1932 年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 | | 山中彰二 |
| 日語普及調查 | 1933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 | 師範學校教授 | 中川彌一 |
| 文獻及研究資料之複製 | | | 杉山直明 |

出處：國立台灣大學藏《台北帝國大學移交檔案》。